

# 莫高窟唐代《维摩诘经变》中的 帝王像及其冕服研究

赵燕林

(敦煌研究院 考古研究所, 甘肃 敦煌 736200)

**摘要:** 在莫高窟 23 铺唐代新样《维摩诘经变》中, 共存有较好的 18 铺帝王像, 这些帝王像冕服服制、人物形象因时代而不同。对比《周礼》等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 这些帝王像大多依据唐代各个阶段的冕服制度绘制而成, 而且与敦煌本土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 更是研究有唐一代冕服制度变迁及人物画艺术的珍贵形象史料。

**关键词:** 莫高窟 维摩诘经变 帝王像 冕服 服制

**中图分类号:** K879.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1-0135-14

## 一、莫高窟唐代《维摩诘经变》中的帝王像

莫高窟现存唐代《维摩诘经变》共计 32 铺, 除漫漶不清的 4 铺和唐初的 7 铺旧式《维摩诘经变》之外, 其余 23 铺都以“贞观新样”的《维摩诘经变》(后文简称“新样维摩变”)的形式呈现,<sup>①</sup>在该经变文殊一侧下部问疾队伍的中心位置一般都绘制有一身身穿冕服的中原帝王像, 这些帝王像多与传为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中的晋武帝司马炎、魏文帝曹丕等穿戴冕旒的帝王像形象相似, 此类帝王像清晰可辨者共存 18 铺。<sup>②</sup>此外, 在同时期的《涅槃经》《观无量寿经》《金光明经》和《地藏十王》变

**收稿日期:** 2019-09-15

**基金项目:** 敦煌研究院 2017 年青年项目“唐代莫高窟帝王图像研究”(2017-SK-QN-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佛教文学艺术思想综合研究(多卷本)”(19ZDA254)子课题“敦煌佛教美术思想史研究”

**作者简介:** 赵燕林(1980-), 男, 甘肃甘谷人。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石窟艺术与美术史研究。

① 王中旭《敦煌翟通窟〈维摩变〉之贞观新样研究》, 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 14 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第 369-397 页。

② 根据笔者调查, 敦煌石窟中的唐代《维摩变》全部绘制在莫高窟。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统计, 榆林窟晚唐第 30 窟中绘制有《维摩变》, 但经实地调查该窟及榆林窟其它唐代洞窟, 均未发现该经变。霍熙亮整理《安西榆林窟内容总录》,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年, 第 204-221 页; 及其附录《维摩诘经变》部分, 第 295-296 页。

中也有绘制，但和“维摩变”中的帝王像相比，这些经变中的帝王像不仅数量少而且形式简单，仅可算作是一种象征或标志而已。而“新样维摩变”中的帝王像则绘制得写实而精致，尤其是各时期不尽相同的冕服服制，更是值得关注。

根据前贤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于敦煌帝王像的专题研究较为鲜见，大多关注于对220窟“新样维摩变”帝王像与《历代帝王图》的对比讨论，且多为介绍性文字。其中，讨论最多者当属段文杰先生，他曾极具见地的指出：“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晋武帝司马炎、光武帝刘秀几乎完全相同，所不同者《维摩变》中之帝王图尽管衣冠服饰与当时制度完全相符，却不是一个具体帝王画像。”<sup>①</sup>此后，王中旭先生专文梳理了莫高窟第103、220、332、335窟中的“新样维摩变”，并论述了第220窟壁画与贞观年间长安流传帝王图像、蕃王使臣之间的关系。<sup>②</sup>赵声良先生则系统论述了唐代莫高窟帝王图像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帝王像的流传情况。<sup>③</sup>同时，叶贵良<sup>④</sup>、盛朝辉<sup>⑤</sup>、曹喆<sup>⑥</sup>等人对此也有过不同的论述。这些研究成果的发布，都为我们系统梳理莫高窟唐代帝王像及相关历史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此外，笔者在讨论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图冕旒问题时，对该窟帝王像所着冕服的纪实属性做了说明，并讨论了此帝王像所着冕服可能为《周礼》所载六冕之絺冕，但对同期其他壁画中的帝王图像却未涉及。<sup>⑦</sup>故本文在前文的基础上，就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经笔者调查，莫高窟唐代“新样维摩变”中的帝王像保存较好者共计18铺。其中，初唐3铺，盛唐2铺，中唐7铺，晚唐6铺。其所绘位置、内容在各时期不尽相同，但其画面形式却始终是以文殊和维摩诘两者对坐辩法的形式呈现的。从服制方面看，各时期帝王冕服服制亦有区别，既有穿戴无旒“大裘冕”和“皮弁”的情形，还有穿戴玄冕、絺冕、衮冕的情况，形式较为复杂。为了梳理之便，现将莫高窟唐代帝王图像所在洞窟号、所绘位置和冕旒数、服制等情况统计如下（表1）：

- 
- ① 段文杰《创新以代雄——敦煌石窟初唐壁画概观》，中国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敦煌5初唐》，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 ② 王中旭《敦煌翟通窟〈维摩变〉之贞观新样研究》，第369-397页。
- ③ 赵声良《帝王图与初唐人物画》，《丝绸之路：图像与历史》，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9-146页。
- ④ 叶贵良《莫高窟220窟〈帝王图〉‘貂尾’大臣非中书信令、亦非右散骑常侍》，《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第22-25页。
- ⑤ 盛朝辉《也谈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图‘貂尾’大臣之身份》，《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第77-84页。
- ⑥ 曹喆《莫高窟唐代壁画维摩诘变中的官员服饰考证》，《敦煌研究》2007年第1期，第45-49页。
- ⑦ 赵燕林《莫高窟第220窟维摩诘经变帝王图像研究》，《敦煌研究》2018年第6期，第20-31页。

表1 莫高窟唐代“新样维摩变”中的帝王像统计表<sup>①</sup>

时代	序号	洞窟号	绘制位置	冕旒数	服制	所属经变
初唐	1	220	东壁门北	6	绀冕	《维摩诘经变》
	2	332	北壁	5		
	3	335	北壁	5		
盛唐	4	103	东壁门北	6	袞冕	
	5	194	南壁	9		
中唐	6	133	东壁门	4	绀冕	
	7	159	东壁门北	3	玄冕	
	8	231	东壁门北	3		
	9	360	东壁门北	4	绀冕	
	10	186	南壁	损毁		
	11	236	东壁门南	皮弁		
	12	237	东壁			
	13	359	东壁门北			
晚唐	14	156	东壁门北	4	袞冕	
	15	12	东壁门北	皮弁		
	16	9	北壁	无旒	大裘冕	
	17	18	东壁门北			
	18	138	东壁门南			
	19	85	东壁门北	旒数不明		
	20	139	东壁	损毁		
	21	141	前室西壁			
	22	150	南壁			

<sup>①</sup> 洞窟排列依据樊锦诗等人的洞窟时代分期研究成果罗列。樊锦诗、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的分期》，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43-181、182-210页。

由上表可知，莫高窟唐代“新样维摩变”打破了隋代以来在西壁龕内、外两侧或上部绘制《维摩诘经变》的格局，不仅品数增加，而且画面内容变得更为复杂。恰如段文杰先生所论：“初唐第220窟维摩诘经变帝王图中之帝王，头戴冕旒，冕板前圆后方，前低后高，垂十二旒，两侧垂黻纁，着大袖青衣，白纱中单，方心曲领，大绶画升龙，红蔽膝，曲裙，黑地红裳，笏头赤舄，衣领十二章，两肩绘日月，衣上遍饰山树，袖端饰粉米等纹，形制文采与唐阎立本‘帝王图’中之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衣冠相同。”<sup>①</sup>其他帝王像也和第220窟帝王像大致相似，但其所着冕服服制都不相同。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我们推测可能与有唐一代各时期舆服制度的调整有着密切关系。

## 二、唐代冕服制度的调整

舆服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帝王的“为邦之道”，由此形成的礼乐典制——包括舆服——既被视作天下大治的标志，又被视作大治天下的手段。据阎步克先生研究，《周礼》所载的“六冕之制”（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包括唐在内的各朝各代祭服的变迁。舆服最大的区别在于冕冠旒数和服装纹章的多少，并以此区别尊卑贵贱，但很长时间以来，臣下的冕服也可以“如王之服”。尤其是在“视朝”和“听朔”的时候，君臣在服饰上难以区分，为了“尊卑有差、贵贱有等”，突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历代都对舆服制度进行调整和更新，而有唐一代更为突出。<sup>②</sup>

唐朝立国，依循隋制。而隋代冕服制度乃采北齐之法，同时也受到北周冕服制度的影响。<sup>③</sup>北齐、北周冕服制度具有的“君臣通用”特点，这一点在隋代冕服制度中得以延续，并直接影响了唐初的冕服制度。唐初统治者注意到了因为“古礼”可能造成的等级扭曲，遂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推出了“武德令”。但到了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巨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虽凭《周礼》，理极未安”的矛盾暴露了出来。于是，长孙无忌、于志宁、许敬宗等大臣认为“服制混乱”导致“君臣不别”，并上书曰：

又检《新礼》，皇帝祭社稷绣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无章。谨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则三公亚献，皆服衮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

<sup>①</sup> 季羨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

<sup>②</sup> 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上）——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下）——〈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2期。

<sup>③</sup> 《通典》记载：“隋采北齐之法……子男则毳冕。五品以上絺冕，五品以上爵弁。”但并未叙及冕旒的情形。参[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57《礼典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04页。

斯乃乘輿章数，同于大夫，君少臣多，殊为不可……请遵历代故实，诸祭并用衮冕。<sup>①</sup>

唐高宗随即“制可”，“自是，鷩冕已下，乘輿更不服之，……而令文因循，竟不改削”。鷩冕以下诸冕，从此被皇帝搁置一旁，等于又回到隋炀帝大业冕制去了。<sup>②</sup>即唐高宗时期皇帝不再穿戴毳、緌、玄冕，即五、四、三旒的冕冠只有大臣在祭祀的时候穿戴了。这一状况一直延续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南郊，玄宗以“大裘朴略，冕又无旒，既不可通用于寒暑，乃废不用之”。“自是，元正朝会，用衮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牲》，亦用衮冕。自余诸服，虽著在令文，不复施用”。<sup>③</sup>自此，“冕服只被看作是一种隆重的礼服”<sup>④</sup>，冕服的使用范围日益萎缩。到了唐文宗开成元年（836）五月“常服御宣政殿”，文宗仅着常服。可见这时连衮冕和通天冠也逐渐退出了实用的领域。<sup>⑤</sup>自此，唐代輿服制度经过不断调整之后，帝王冕服已经失去原本的意义。

总的来看，有唐一代輿服制度屡有变迁，但基本都以“武德令”和“开元礼”为据。而“武德令”服制冕旒以九、七、五、四、三为差，“开元礼”服制以九、七、六、五、四为差”。<sup>⑥</sup>其不同点我们引用阎步克先生所作“《周礼》郑玄注与两《唐书》的冕旒级差表（表2）”：

表2 阎步克先生所作“《周礼》郑玄注与两《唐书》的冕旒级差表”<sup>⑦</sup>

		大裘冕	衮冕	鷩冕	毳冕	緌（绣）冕	玄冕
《周礼》 郑玄注	天子	无旒	十二旒	九旒	七旒	五旒	三旒
	臣下	无旒	九旒	七旒	五旒	四旒	三、二、一旒
《旧唐书》	天子	无旒	十二旒	七旒	五旒	四旒	三旒
	臣下	无旒	九旒	七旒	五旒	四旒	三旒
《新唐书》	天子	无旒	十二旒	八旒	七旒	六旒	五旒
	臣下	无旒	九旒	八旒	七旒	六旒	五旒

①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5《志第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38-1939页。

② 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下）——〈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第95页。

③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31《輿服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62页。

④ 孙机《两唐书輿（车）服志校释稿》，《中国古輿服论丛（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

⑤ 孙机《两唐书輿（车）服志校释稿》，第409页。

⑥ 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下）——〈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第93页。

⑦ 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下）——〈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第93页。

由此表可知,《周礼》和新、旧《唐书》中除大裘冕与衮冕所载冕旒数相同以外,鷩冕、毳冕、絺冕和玄冕的旒数完全不同。故考察唐代帝王服制问题,需要关照“武德令”和“开元礼”的时效问题。据前文可知,大可将唐代服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从唐朝建立的618年到“武德令”颁布的624年为沿袭隋朝服制阶段;第二,从“武德令”推行的624年到“开元礼”颁布的732年为“武德令”服制阶段;第三,从“开元礼”推行的732年到唐文宗开成元年(836)五月“常服御宣政殿”为“开元礼”服制时期;第四,唐文宗开成元年五月直至唐结束为“常服”服制时期。也由此可知,唐代舆服制度至少有过四种面貌,这不仅反映在唐代文献中,还反映在这一时期的敦煌《维摩诘经变》的帝王像中。但需要注意的是,安史之乱以后,敦煌一度为吐蕃和归义军节度使统治,这也是导致莫高窟唐代帝王图像形式多样的主要原因。因为不同的统治者在表现地位尊卑的帝王图像时,无疑会注入自己的政治意志及愿望。

### 三、莫高窟唐代帝王像及其服制的变化

#### (一) 初唐时期敦煌帝王像及其服制

一般来说,敦煌初唐时期为唐高祖建国到武则天退位这一段时期(618-705年)。莫高窟第220、332、335窟属于这一时期开凿完成的洞窟,其中都绘制有“新样维摩变”,此三窟帝王像分别穿戴六、五、五旒冕冠(图1、2、3)。根据洞窟时代信息,三窟帝王冕服应该是依据“武德令”服制绘制。但检索《旧唐书》等与武德令相关的文献资料,其中没有六旒冕冠的记述,却有五旒絺(绣)冕。我们推测,这一服制与初唐舆服制度不断调整的历史密切相关。



图1 莫高窟第220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2 莫高窟第332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3 莫高窟第335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1. 莫高窟第220窟开凿完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其东壁“新样维摩变”帝王像是敦煌现知最早的帝王像,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和传为唐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晋武帝司马炎像等帝王像都极为相似。但《历代帝王图》中的晋武帝司马炎等帝王穿戴十二旒衮冕,而第220窟帝王像却穿戴六旒冕冠。根据贞观十六年这一时代背景推断,第220窟帝王像所着六旒冕冠系唐“武德令”和“开元礼”纠缠期间借鉴北齐、北周或隋初冕服制度的产物,而非前人所谓初唐帝王应着服制。<sup>①</sup>另据史睿先生考证,初唐第220窟《维摩变》是现存隋代孙尚之新样《维摩变》的最早作品。<sup>②</sup>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该窟帝王冕服依隋制而来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2. 莫高窟第335窟北壁“新样维摩变”绘制完成于圣历年间(698-699),<sup>③</sup>其中帝王像穿戴五旒冕冠。据前文可知,武周冕服制度沿用“武德令”之制,故检《旧唐书》可知,此一时期的五旒冕冠为天子所着“绀冕”。但有意思的是,该窟帝王像冕旒数虽然和第220窟旒数不同,但两者服制一致,都为“绀冕”。可据此推测,第335窟帝王像应该是对第220窟帝王像的复制和移用,只是第335窟帝王像改用了武德服制,使得二者冕旒数发生变化。

3. 第332窟建成于武周圣历元年(698),<sup>④</sup>该窟北壁“新样维摩变”所绘帝王穿戴五旒冕冠,亦系“武德令”之“绀冕”。根据原保存于该窟的《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碑文内容可知,该窟是时任“大周沙州左玉钤卫劾谷府校尉”的李克让修建的功德窟。有学者曾指出,第332窟是李克让家族融入全国拥戴武周、崇信佛教热潮的表现。<sup>⑤</sup>如

① 赵燕林《莫高窟第220窟维摩诘经变帝王图像研究》,第20-31页。

② 史睿《隋唐法书屏风考——从莫高窟220窟维摩诘经变谈起》,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9-359页。

③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94-236页。

④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第194-236页。

⑤ 杨效俊《王权、佛法、家族与敦煌的宗教空间——以莫高窟李氏家族所供养的第332、148窟为中心》,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28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9年,第259-273页。

此，帝王像应该是严格按照当时服制而成的观点便不难理解。

## （二）盛唐时期敦煌帝王像及其服制

根据樊锦诗等先生的断代分期研究，盛唐为李唐复辟到吐蕃攻陷敦煌一段时期（705-781年），这一时期敦煌石窟中绘制有“新样维摩变”的有莫高窟第68、103、194窟三窟。<sup>①</sup>其中，第68窟画面漫漶不清，帝王具体形象不得而知，在此不做推测。第103、194窟帝王像绘制为六、九旒冕冠的形象（图4、5）。

1. 一般认为，盛唐第103窟“新样维摩变”所据粉本和初唐第220、335、332窟相同，且人物线条更为遒劲，风格更趋成熟。<sup>②</sup>其中帝王像冕服和第220窟帝王像冕服制完全一致，皆戴六旒冕冠。前文已论，“开元礼”颁行于唐开元二十年（732），而此窟开凿时代“大致在中宗、睿宗、玄宗前期开元时期（705-749年）”<sup>③</sup>，故我们推测此窟帝王像冕服服制应该是依据“开元礼”而成，该窟最早绘制完成于“开元礼”颁布之后，即唐开元二十年（732）之后。



图4 莫高窟第103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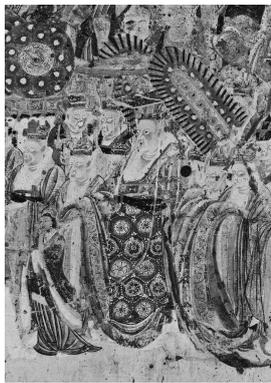


图5 莫高窟第194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2. 盛唐第194窟开凿时间，“上限早不过天宝，下限当晚不过沙州陷蕃的建中二年（781）”<sup>④</sup>。该窟“新样维摩变”中的帝王像头戴九旒冕冠，着青衣纁裳。就其冕服细节来看，冕冠前排旒珠为绿色，后排为青色；青绿色相间的上衣，两肩绘日月，两袖间各绘“星辰”、粉米和黻章，并暗饰青色山章；白色中单；腰间一绿色菱格纹大带，正前方方格内青绿色间饰；大带下方为红色革带，正前方紧扣钩牒；左腰间佩剑，剑镡未镶一蓝色宝石；左腰一青绿色相间的大绶，从革带处自然垂于脚上。与前者帝王像对比来看，该窟帝王像粉本形式完全不同于初唐及盛唐第103诸窟。前文所论五窟帝王服制

① 樊锦诗、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的分期》，第143-181页。

② 李昉《万国衣冠拜冕旒——敦煌壁画中的朝贡者形象》，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19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9-206页。

③ 樊锦诗、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第171页。

④ 樊锦诗、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第181页。

虽有不同，但衣裳颜色却都为“玄衣纁裳”，<sup>①</sup>而该窟帝王却为“青衣纁裳”。因此，该窟帝王应据新的粉本或应其它服制而成。《新唐书》载：

衮冕者，一品之服也。九旒，青綦为珠，贯三彩玉，以组为纓，色如其纓。青纁充耳，宝饰角稽导。青衣纁裳，九章：龙、山、华虫、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皆绛为绣遍衣。白纱中单，黼领，青褙、褙、裾。朱袜，赤舄。革带钩褙，大带，黻随裳色。金宝玉饰剑鏢首，山玄玉佩。绿纁纁，绿质，绿、紫、黄、赤为纯，长一丈八尺，广九寸，二百四十首。效祀太尉摄事亦服之。<sup>②</sup>

对比第194窟帝王像冕服和文献资料来看，这一冕服和《新唐书》载一品大臣所穿“衮冕”服制一致，系“效祀太尉摄事”之服，可能是“开元礼”之后“青衣纁裳”之“衮冕”的写照。因为该窟“新样维摩变”中的各国王子无论人物排列、方位或是选择，均与晚唐的各国王子图相似，但这一粉本却不为随后吐蕃统治者所采用，而在归义军统治时期则成为主流。这是因为，安史之乱以后，基于众多原因，朝集制度逐渐崩坏，取而代之的是方镇进奏院，元日朝会中诸州朝集使诸蕃客使共同构成的帝国秩序也随之崩塌，政治理想化的意图促成了该窟新型粉本的出现，其《各国王子图》不再写实，而是用衣着华丽、队伍庞大的“各国王子”表现盛世“王会图”的政治意象，为一种政治祝愿。所以，尽管这种粉本的内容远远悖离实际情况，但恐怕依然是唐帝国政治现状的写实。<sup>③</sup>由此我们推测，该窟头戴九旒冕冠、着青衣纁裳的帝王像表现的正是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式微，地方政权势力加强的反映。所以，“新样维摩变”中本来的帝王像被更换成了节度使形象假设便成为了可能。

### （三）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帝王像及其服制

敦煌吐蕃政权时期（781-848年）的“新样维摩变”，最显著的特征是吐蕃赞普进入到了各国王子图的中心位置，这也是目前学界判断吐蕃统治时期所开洞窟的主要依据。该时期共存帝王图像8铺，7铺出现在“新样维摩变”中，1铺出现在《涅槃经变》中。此一时期“新样维摩变”中的帝王像，如第133、159、231、360窟中的帝王像分别穿戴四、三、三、四旒冕冠（图6、7、8、9）；第236、237、359窟帝王像全部穿戴“皮弁”（图10、11、12），这也是这一时期帝王像的主要特点。而第158窟《涅槃经变》中的帝王像穿戴3旒冕冠。

① 《周礼》曰：“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即冕服上衣为“玄色”，下裳为“纁色”。[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1《司服》，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51-552页。

②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4《车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页。

③ 李昉《万国衣冠拜冕旒——敦煌壁画中的朝贡者形象》，第169-206页。



图6 第133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7 第159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8 第231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9 第360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10 第236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11 第237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12 第359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前文已叙，除初、盛唐时期的帝王冕服外，其它时代的帝王冕冠旒数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或标志。故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帝王像，已不再是按照唐朝服制而来，可能仅仅是作为对故有图像粉本的借用或延伸。若依唐制，则三旒冕冠者为《旧唐书》所载之“玄冕”，四旒者为《旧唐书》所载之“绀（绣）冕”。有意思的是，《新唐书》中没有

### 三、四旒冕冠的相关记述。

最为特殊的是，第 236、237、359 窟中帝王一改前代穿戴冕旒的传统，代之而来的是“皮弁”。《周礼》谓：“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又《新唐书》谓：“弁服者，朔日受朝之服也。以鹿皮为之，有攀以持发，十有二綦，玉簪导，绛纱衣，素裳，白玉双佩，革带之后有鞶囊，以盛小双绶，白鞮，乌皮履。”<sup>①</sup> 据此可知，无论哪种“皮弁”，其都有君臣通用的特点，形制又都差别不大。所以第 236、237、359 窟中出现穿戴“皮弁”的帝王图像，一者是有意降低中原帝王身份；二者兼有提升对应吐蕃赞普身份的意愿，因为这一时期文殊一侧的赞普形象变得更为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帝王像虽然头戴皮弁，却所穿冕服皆“青衣纁裳”。前文已论“青衣纁裳”者臣下穿戴之冕服。所以，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壁画中穿戴皮弁冕服的帝王像，可能是依据第 194 窟帝王像形制而来。

如果我们将敦煌吐蕃时期的帝王像作一类比，则呈现出两种面貌：一，穿戴冕冠的帝王图像，如第 133、159、231、360 窟“新样维摩变”，以及第 158 窟《涅槃经变》中的帝王像；二，穿戴“皮弁”的帝王像，如第 236、237、359 窟。这样一种变化应与其时吐蕃政权的统治密切相关。根据王中旭等先生的研究：“敦煌吐蕃时期的《维摩变》新样应出现在 821-822 年长庆会盟之后到 848 年之间，前后时间跨度不超过 30 年”，并认为第 237、231、133、359 窟赞普及随从像绘制时代当在 830 年代中期至 840 年代早期之间；第 360、159 窟应绘制于 840 年代早期至 848 年。<sup>②</sup> 据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帝王像服制的变化，大致可以推断出这些壁画绘制完成的前后时间关系。即穿戴四旒冕冠的第 133 和穿戴三旒冕冠的第 159、231 窟的绘制时代应早于穿戴皮弁帝王像的第 236、237、359 四窟，而最晚者当为穿戴四旒冕冠帝王像的第 360 窟，这一点基本和樊氏分期所论一致。<sup>③</sup>

依上所论，吐蕃时期帝王冕服大致经历了“四旒——三旒——皮弁——四旒”这样一种流转程序，而这一过程却为我们推断各窟先后时代提供了重要线索。即第 133 窟属于吐蕃早期洞窟（其帝王像穿戴四旒冕冠），紧随其后的则为绘制有穿戴三旒冕冠帝王像的第 159、231 和 158 窟，而绘制穿戴皮弁帝王像的第 236、237、359 窟的绘制完成时代可能稍晚。具体而论，其一，第 360 窟和第 159 窟图像属于成熟阶段，但 159 窟时代略晚，<sup>④</sup> 又第 231 窟（阴嘉政窟）纪年显示该窟开凿于 839 年，此窟和第 159、158

①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 24《车服志》，第 516 页。

② 王中旭《赞普的威仪——试论敦煌突吐蕃时期赞普及随从像的演进》，《艺术设计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18-25 页。

③ 樊锦诗文认为第 132 窟属于吐蕃早期洞窟，即 8 世纪 80 年代到 8、9 世纪之际；第 237、359、360、159 窟，以及第 44、185 窟属于吐蕃晚期前段洞窟，即 9 世纪初至 839 年左右；第 359 窟属于吐蕃晚期后段，即 9 世纪 40 年代。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分期研究》，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第 182-210 页。

④ 王中旭《赞普的威仪——试论敦煌突吐蕃时期赞普及随从像的演进》，第 21 页。

窟帝王所着服制一致，故此三窟绘制时限应不会相差太远。其二，第359窟中的帝王像所戴皮弁不同于第236、237窟的帝王所戴皮弁，其冠饰、服装颜色几乎全为褐色，而第236、237窟几乎全部为黑色，且周围侍从也不同于其他。再据樊氏分期，第359窟属于吐蕃晚期后段，则第236、237二窟绘制时代应更为接近，应在第359窟之前。如此，大致可以梳理出各洞窟的前后时代关系。即第一期洞窟为第133窟；第二期洞窟为第159、231、158窟；第三期洞窟为第236、237、359窟；最后一期为第360窟。也由此可知这一图像所内涵的不同寻常的地位和价值。

#### (四) 张氏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帝王像及其服制

敦煌晚唐时期，实为张氏归义军统治时期（851—907年）。这一时期共有10铺“新样维摩变”，其中第9、12、18、138、156、85窟帝王像保存较好（图13、14、15、16、17、18），第139、141、150窟帝王图像损毁，即现存此一时期完整的帝王图像共有6身。除第156窟帝王像穿戴四旒冕冠和第12窟帝王像穿戴不同于以往皮弁的冠冕外，其余3身全为无旒之大裘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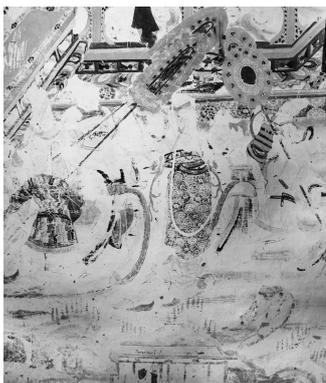


图13 第9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14 第12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15 第18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16 第138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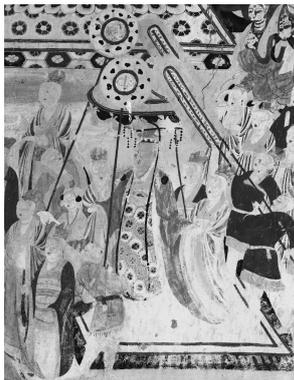


图17 第156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18 第85窟帝王像  
(敦煌研究院提供)

第156窟是敦煌首任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洞窟，完成时间大致在唐大中五年

至大中十年间（581-586）。<sup>①</sup>其中所绘“新样维摩变”帝王像冕服和吐蕃第360窟一致，依然有吐蕃统治时期粉本的影响，但又突出了中原帝王的地位。这种变化，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一时期已摆脱或减弱了吐蕃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的绘画风格。

在张氏功德窟的影响下，约862-867年间，归义军第二任都僧统翟法荣修建了第85窟。<sup>②</sup>从绘画形式上来看，该窟帝王像和第156窟帝王像极为相似，两者可能使用了相同的粉本，只是第85窟帝王像冕冠旒数部分因损毁具体情况现不得而知。在随后的咸通十年（869）前后，敦煌望族索义辩主持营造了第12窟。<sup>③</sup>而第12窟“新样维摩变”帝王像却穿戴异于其他冕冠的黑色皮弁，其具体原因还得再行讨论。

反观同期其它洞窟，现存第9、18、138三窟“新样维摩变”帝王像全部穿戴无旒大裘冕。所谓大裘冕，其最大的特点是冕冠无旒，为诸冕中级别最高的冕服。《周礼》曰：“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sup>④</sup>新旧《唐书》皆曰：“祀天地之服也。”<sup>⑤</sup>但玄宗开元十一年冬（713），玄宗以“大裘朴略，冕又无旒，既不可通用于寒暑，乃废不用之”。“自是，元正朝会，用衮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牲》，亦用衮冕。自余诸服，虽著在令文，不复施用。”<sup>⑥</sup>因此早已退出唐代冕服舞台的大裘冕，为何会在敦煌归义军时期重新使用，应该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我们推测，这一图像在这一时期的出现，至少表明归义军政权在有意抬升与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之间的关系。

#### 四、结语

唐朝前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鼎盛期，亦是敦煌石窟发展的高峰期。唐朝中后期，其统治由盛转衰，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是学界公认的分界线，而敦煌一般以吐蕃占领的建中二年（781）为分界点，分唐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时期（武德初至建中二年，618-781年）；吐蕃占领时期（建中二年至大中二年，781-848年）；张氏归义军统治时期（851-907年）。而作为统治者象征或符号的帝王图像，不可能随意而作，根据笔者调查及比对相关文献，可知有唐一代敦煌“新样维摩变”中的帝王图像基本按照当时帝王形象或服制描绘而成，具有极高的

① 李国、沙武田《莫高窟第156窟营建史再探》，《敦煌研究》2017年第5期，第55页。

②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第194-236页。

③ 范泉《莫高窟第12窟供养人题记、图像新探》，《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第86-90页。

④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1《司服》，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49页。

⑤ 《旧唐书》曰：“祀天神地祇则服之。”（[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5《舆服志》，第1936页）；《新唐书》曰：“祀天地之服也。……黑表，纁里，无旒，金饰玉簪导，组带为纓，色如其纓，黻纁充耳。”（[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4《车服志》，第514页）。

⑥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31《舆服上》，第662页。

历史研究价值。

本文首先统计了唐代各时期帝王图像的分布及形式、服制等情况。其次在分析现存18身帝王像的过程中,根据历史文献等资料对帝王服制的演变历史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认为敦煌石窟中的唐代帝王图像,不仅与敦煌历史密切相关,而且具有严密的演进程序。

第一,初唐时期的帝王冕服皆为《周礼》之“絺冕”。第220窟帝王六旒冕冠系唐初沿袭北周及隋代服制而成的“絺冕”。第332、335窟五旒冕冠为“武德令”之天子“絺冕”。

第二,盛唐时期的帝王冕服应依据“开元礼”而成,并沿袭了唐初以来的服制,最初沿用“絺冕”,后因为其他原因而改为衮冕。第103窟六旒之冕系“开元礼”之“絺冕”。第194窟帝王“青衣纁裳”穿戴九旒衮冕,这不仅与玄宗“诸祭并用衮冕”的史实相符,而且与“安史之乱”后的军镇制度密切相关。

第三,吐蕃统治时期,帝王图像一改前代穿戴“六冕”的形式,首先出现了依“武德令”而来的四旒“絺(绣)冕”;接着改为了依“武德令”而来的三旒“玄冕”;接着全部改为“六冕”之外的皮弁;最后又改为了四旒“絺(绣)冕”。这样一种变化,笔者推测应与吐蕃严苛的统治不无关系。还有,通过对这一时期服制的类型分析,可以看出帝王服制的变化和洞窟绘制时代几近吻合,更与其时历史密不可分。

第四,张氏归义军时期,除咸通六年(865)建成的第156窟帝王穿戴四旒“絺冕”和第2窟帝王穿戴皮弁外,其余如第9、118、138三窟帝王全部穿戴“大裘冕”。这一变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与晚唐归义军政权既尊中原王朝为正朔,又刻意抬高自己统治地位的历史息息相关。

总之,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帝王像,是有唐一代历史变迁的写真。历经初唐的发展,到盛唐的鼎盛,再到吐蕃(中唐)的过渡,直至张氏归义军政权(晚唐)的衰落,各时期的舆服制度伴随着帝国政权的更迭而不断调整。如果穿戴冕冠是华夏帝王的基本标志,那么吐蕃政权时期穿戴皮弁的中心人物和张氏归义军时期穿戴三、四旒冕冠的帝王形象可能就是地方政权的统治者的写真,归义军后期穿戴无旒“大裘冕”的帝王形象便是尊中原王朝为正朔的某种期盼。